



中國最早的後殖民文本？—— 老舍〈小坡的生日〉論析

葉金輝

文學博士，馬來西亞華團執行秘書

摘要

學者王潤華認為老舍〈小坡的生日〉是中國最早的後殖民文本。〈小坡的生日〉讚揚作為資源壟斷與文化殖民重要管道的英校，未直接針對後殖民主義，無異於消除了尚處模糊的後殖民批評意識。老舍並無（朱崇科所言）「大中華心態」，而所謂的後殖民「預言」，正與新加坡現實的文化文本（英語與殖民崇拜情結）相悖。意識到康拉德的偏見，老舍只追求康拉德式的人類心靈描寫。因此，〈小坡的生日〉是老舍「打了個大大的折扣」之後的「四不像」作品，遠離了創作動機，只能視為反殖民文學，而非中國最早的後殖民文本。

關鍵詞：文化霸權、反殖民文本、東方主義、後殖民批評意識、殖民情結。



The Earliest Post-colonial Text in China?: Analysis on “Xiao Po de Shengri” of Lao She

Yap, Kam-Fai*

Abstract

Wang Runhua, a scholar, pointed out that Lao She’s novel “Xiao Po de Shengri” was the earliest post-colonial text in China. Actually, it just was merely an anti-colonial text. From just looking at its content, its praise of the English school, which as a monopoly resources and cultural colonial, without directly criticized post-colonialism undoubtedly eliminated the vague consciousness of post-colonial criticism. Lao She did not hold a “Chinese superiority complex” which commented by Zhu Chongke, while the so-called post-colonialism “prophecy” was contradictory with Singapore’s reality cultural text, which has English and colonial worship complex. Aware of Joseph Conrad’s prejudice, Lao She only pursued Conrad’s style of describing the human soul. Therefore, “Xiao Po de Shengri” was a works in which he failed to accomplish his original intentions. It could only be considered an anti-colonial, not a post-colonial works.

Keywords: Cultural hegemony, Anti-colonial text, Orientalism, Post-colonial critical consciousness, Colonial worship complex.

* Ph.D in Literatur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Nantah Foundation, Malaysia



一、前言

1929年，老舍（1899-1966）留居新加坡期間寫了長篇小說〈小坡的生日〉（簡稱〈小〉）。一般上人們目之為兒童文學，不受重視，而且很少被探蹟。1979年，它被新加坡漢學家王潤華（1941-）稱為「中國最早的後殖民文本」。¹

有學者指出「後殖民論述也是西方學術及其生產的產品」。²實質上，後殖民主義批評主要奠基人與大部分思想家諸如弗朗茲·法農（Frantz Fanon）、愛德華·薩義德（薩依德）（Edward Wadie Said）、霍米·巴巴（Homi Kharshedji Bhabha）、加亞特裏·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艾賈茲·阿赫默德（Aijaz Ahmad）、阿君·阿帕度萊（Arjun Appadurai）、艾梅·塞澤爾（Aime Cesaire）、阿裏夫·德里克（Arif Dirlik）等，都是來自第三國家的東方人。³後殖民主義批評家借助後現代主義理論控訴西方中心主義，大有「師夷之長以制夷」（清·魏源《海國圖志》）之特點。

殖民主義直接的控制基本已結束，但「帝國主義像過去一樣，在具體的政治、意識形態、經濟和社會活動中，也在一般的文化領域中繼續存在」，⁴此乃後殖民

¹ 王潤華並未舉證此命題的根據，王潤華：〈中國最早的後殖民文本：老舍的《小坡的生日》對今日新加坡的後殖民預言〉，《華文後殖民文學—中國、東南亞的個案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頁37。王潤華的該篇原題為〈老舍在《小坡的生日》中對今日新加坡的預言〉，最初收錄在王潤華：《老舍小說新論》，（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中國大陸版是王潤華：《老舍小說新論》，（上海：學林出版社，1996）。後來該文也收錄在於2001年出版的王潤華：《華文後殖民文學—中國、東南亞的個案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中。本文采2001年最新的版本為準。

² 朱崇科：〈後殖民老舍：洞見或偏執？—以《二馬》和《小坡的生日》為中心〉，《中山大學學報》（社科版）第2期，2007年，頁16。

³ 弗朗茲·法農出生於法屬阿爾及利亞，是廣義上的東方人。

⁴ （美）賽義德（Edward W. Said）著，李琨譯：《文化與帝國主義》，（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頁10。



主義。後殖民文學即為批判與抵制前宗主國在政治、意識形態、經濟、文化霸權色彩等方面滲透與關係的話語，這是本文的定義。部分後殖民批評意識發軔於殖民時期，同樣地，後殖民文學不一定產生於殖民地獨立以後，它可能是用宗主國或殖民地語言創作的作品。二十世紀 90 年代以降，中國學界為中國文學的後殖民批評與文論的合/非法性聚訟不已；如果把視野挪前至現代文學時期，或可勾察出不同的論點。我們以上述對后殖民文學的義界，作為審察〈小〉的前提，並對其後殖民文本提出質疑。

二、老舍的「預見」與新加坡英語文化

小說中，小坡生活在花園裏，這個花園成為他和其他民族小孩的天堂。王潤華把花園視作老舍的「遠見」，因為「預見」了三十餘年後新加坡獨立後建立「花園城市」的計畫。這種預見也出於老舍「被南洋地區得天獨厚的綠樹林所迷住」。⁵於此，王潤華對〈小〉做了離題的詮釋。1930 年前後，許多殖民地、第三國家包括中國主要仍處於農業社會，綠樹林隨處可見，如此構成的「預見」並無必然性，無疑陷入牽強的神秘主義與停留在表面的觀感聯想上。假設欲賦予〈小〉以深度的解讀，不妨指說「花園」涵義呼之欲出，希臘哲學家伊壁鳩魯（Epicurus）就在他的花園講學，聽眾來自各階層人士，不分卑賤，「花園」遂成為友誼與快樂的象徵。因此，「花園」與其謂為老舍預示後來新加坡的城市綠化計畫，毋寧說是一種暗示性象徵——花園繁花似錦，各放異彩，與新加坡多元文化社會特徵不謀而合，更切合老舍「後殖民文本」的旨意。

小坡的廣東學校班主任經常在講臺上站著睡覺，因此他隨時可溜出去玩耍，馬來學生上馬來學校每天午前十一點鐘才上學，見過老師後便可以回家，英校的

⁵ 王潤華：《華文後殖民文學——中國、東南亞的個案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頁 43。



教師也非常馬虎。⁶依此推論，這是否意味老舍又預見了新加坡未來的教育將會是一塌糊塗？如果小說反映現實，這肯定不是現實的全部。王潤華指出，小坡納悶為什麼各族朋友要分開上課，小坡的「構想」多年後為政府實現了；1959年政府統一各語文源流學校，1965年推行雙語制度。⁷可是，王潤華卻沒透視這些政策與〈小〉這個「後殖民文本」存有二致，也未必是小坡的「新加坡意識」，因為新加坡的雙語制是一種失衡的多元政策，主次嚴明有別的雙語教育。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當初學習華語是出於政治動機，⁸其工具理性與後來打造成官方英語（文化）霸權，可謂前後相互印證。新加坡建國後，在政府崇洋心態與殖民情結下，所謂雙語教育政策，是以英語為國語，是新加坡「頂層語言」，華文淪為一個科目。新加坡中小學中國語文程度比中、港、臺水準低。根據調查顯示，華裔學生的最基本中華文化知識「令人擔憂」，⁹這種政策與情況至今幾乎不變。易言之，心態與政策偏差造成新加坡中學華文教育只相當於中、港、臺與馬來西亞的小學母語程度。再者，政府用了十八年計畫性地摧毀華校，並最終於1980年強行關閉了東南亞唯一的華文大學—南洋大學。這無異於絕續華文教育的命脈，自我「他者化」，並把華文鉗制在小學簡單的溝通層次，淺嘗即止。王潤華該文寫於1979年，至少可從教育政策「預見」到教育的前因與文化的後果。如此態勢下，指稱小坡的「新加坡意識」在現實中實現了，等於叫小坡與各族朋友放棄母語學校，投向英校，這又何嘗是小坡的意願？限制各族母語與方言的發展，奉殖民地語言為國語，可稱得上是後殖民的多元並存？

⁶ 老舍：〈小坡的生日〉，《老舍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頁38-41。

⁷ 王潤華：《華文後殖民文學—中國、東南亞的個案研究》，頁47。

⁸ 1950年代的新加坡華人口占六成之多，李光耀認為要贏得選票，英語幫助不大，於是學好華語「成了我刻不容緩的任務」，李光耀：《我一生的挑戰—新加坡雙語之路》，（新加坡：聯合早報，2011），頁29。

⁹ 小學生接觸母語的時間在29%以下，中學生則在19%以下。1971年英校入學率達69%，1984年高達99%，華文源流學校才0.7%。1994以前，華語是華人學生的必修科，但只有8%左右各科成績特別優異的學生才准修高級母語課程，其餘92%只修普通母語課程。全國數百間學校只保留九所華文源流中學，作為培養雙語人才基地，周清海：《華文教學應走的路向》，（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1998），頁4，7-9，11，30，49，69，76。



王潤華指出，新加坡的後殖民文學是「雙重傳統」，即種族文學傳統與本土文學傳統的融合，形成多元文化背景。舊式殖民地時期的種族學校「加深了各族間的差異，促成彼此隔膜的永恆性，這是各民族間新加坡認同的一大障礙」。¹⁰這是新加坡政府灌輸國人的政治文化認知工程中，所給予的標準答案與抑制母語教育的胎人口實，因為李光耀也表示為求一種共同的國家觀念與標準教導新一代，必須打破平等統一與各源流的藩籬。¹¹事實上，這是近乎以制度暴力形塑獨斷的國族意志與語言神話，因為多元源流教育並無阻國民團結與國家效忠，馬來西亞的國民、華文、淡米爾小學、國民、國民型中學與華文獨立中學並存即是反證。既然馬來西亞華人有能力掌握馬、華、英與多種方言，一岸之隔的新加坡華人豈會無能為力？加拿大、瑞士、芬蘭、印度等國家更是兩種國語並行，而「亞洲四小龍」之中除了新加坡，其他三「小龍」與日本未唯英語是尚，綜合素質與表現卻比新加坡有過之而無不及。

梅洛-龐蒂 (Maurice Merleau-Ponty) 指出，只有母語源於我們生命之根，揭示出一個表現靈魂的話語體系，其他語言只能作為母語表達思想的補充。「我們能講好幾種語言，但只有一種語言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語言。為了全面掌握一種語言，必須安於該語言表達的世界，我們不能同時屬於兩個世界。」¹²可以說他道破了母語的重要性，但又顯然他不了解在南洋一帶，新加坡不是民族國家，華語、馬來語與洋涇濱語早已成為在地的混合物，可說是殖民地經過「棄用」與「挪用」後的語言重置 (Replace language)，¹³亦如霍米·巴巴的「混雜」論 (Hybridity)。「混雜」過程中，被殖民者給殖民者同化，反倒達致「模擬」效果，

¹⁰ 王潤華：《華文後殖民文學—中國、東南亞的個案研究》，頁 47，96-97。

¹¹ 李光耀：《我一生的挑戰—新加坡雙語之路》，頁 39，43。

¹² 王嶽川：〈梅洛-龐蒂的現象學與社會理論研究〉，《求是學刊》第 6 期，2001 年，頁 23；(法) 莫里斯·梅洛-龐蒂 (Maurice Merleau-Ponty) 著，姜志輝譯：《知覺現象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頁 244。

¹³ (澳大利亞) 比爾·阿希克洛夫特 (B. Ashcott)，格瑞斯·格裡菲斯 (G. Griffiths)，海倫·蒂芬 (H. Tiffin) 著，任一鳴譯：《逆寫帝國：後殖民文學的理論與實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頁 34-35。



「他者」退位，激發了自我意識，成為顛覆殖民文化權威的策略。¹⁴背道而馳的是，新加坡政府大力倡導字正腔圓的正統英語，邊陲化其他語言，消弭了民間語言自然涵化的「混雜」對後殖民主義的反撲。

在務實政綱與實用理性的原則背後，更大程度實則是政府歧視華文教育。在失衡的英語政策與社會環境支配下，受華文教育者越來越少，新加坡南洋大學（華文大學）文憑不受政府承認，華校生在社會上無立錐之地，備受邊緣化，幾乎滅絕各民族母語教育發展。華文教育被消滅，李光耀雖然聲稱為國家獨立與利益設想，可是實際上卻複製了大英宗主國的霸權文化，制定英語至上與英國制度至上的政策。此種文化與語言本質主義，在在以殖民優越感自擁，樂於培育「黃色皮膚，歐美思想」（黃皮白心）的「香蕉人」。¹⁵

在世人讚羨新加坡所取得的成就之際，卻無視它歸宗英殖民文化與**殖民崇拜**，建構英語霸權神話，罔顧民族的意願，自上而下，不惜把各族文化強硬統攝

¹⁴ (印)(霍米·巴巴) Homi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p. 86, 88, 112-116.

¹⁵ 周恩來稱李光耀為「內白外黃」的「香蕉人」，約翰·培瑞（John C. Perry）著，林添貴譯：《新加坡的非典型崛起：從萊佛士爵士到李光耀，駕馭海洋的小城大國》，（臺北：八旗文化/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0），頁 295。中斷了華文教育與左翼勢力的關係後，1979 年新加坡政府為了建立華人的國家歸屬感、身份認同感與經濟考量而推廣華語運動，第一句口號是「多講華語，少說方言」，禁止電視電臺節目講說方言。可是，李光耀只用英語和家庭成員交談，內閣與國會成員亦如是，未以身作則。但是，華語運動畢竟在民間成功了，代價卻是方言與方言文化藝術的式微。七八十年代，西化產生了負面影響，年輕一代的傳統價值觀日漸薄弱，個人主義日趨嚴重，為了加強公民心理與責任感，新加坡於 1982 年發起儒學運動；應邀參與的杜維明指出「在母語中才能形成認同，特別是文化的認同」，卻立即遭到新加坡部長否定。儒學運動後來因顧忌其他少數民族的憂慮，加上印尼伊斯蘭教的壓力而無疾而終，盡顯儒學只是被當作一種可喚來呼去供差遣的政治教化工具。1994 年，為求剔除隨西化而引入的民主與人權思潮，杜絕西方社會的示威、罷工、問政等文化，意欲鞏固政治威權的李光耀提出「亞洲價值觀」，招致當年儒學運動特邀專家之一余英時抨擊為「文化宿命論」。李光耀較後於在 2001 年又放棄了「亞洲價值觀」。隨著中國的崛起，又重新重視華語，不過僅止於商用與初級交際層次，見呂元禮：《新加坡為什麼能》下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頁 88；（美）杜維明著，高專誠譯：《新加坡的挑戰：新儒家倫理與企業精神》，（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頁 214，218；余英時：《現代學人與學術》，（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 93。



在語言神話之下，造成民族文化系統的斷裂。語言是文化的載體，為求致力於現代化，新加坡對語言文化結構與系統紐帶的功利設計與任意裁剪，反復無常的興此遏彼，嚴重破壞與犧牲了文化生態發展，語言的文化價值喪失。這種極度短視的政策，源自於務實的絕對化國策與信仰、西化的文化邏輯與被授予的認知暴力（「政治正確」）。它造成難以彌補的靜態人文災難，諸如民族的失根、身份認同錯位、社會依賴性強、文化創造力弱、創業精神低、移民率高、國家歸宿感貧乏、不奉養父母、政治冷感、重理輕文等。¹⁶同時，家長式高壓專政、嚴刑峻法、行為律令與管控、鉗制言論自由、侵犯公共空間與私人生活下，¹⁷國人的政治熱情、壓抑的人格心理、不服從或憤懣的異議與文化矛盾被轉移至工商科技、通俗消費與物質文化。片面的現代性導致精神空虛、價值失落、抗壓性小、主體性異化、世俗性僭越超越性，淪為高科技與經濟動物等人文與倫理危機，¹⁸乃後殖民文化所束手無策。

¹⁶ 21%新加坡青年不願當華人，寧可當洋人與日本人；移民率高達 3.3%，有移民意願的人多達 20%。1994 年，新加坡成為世界上首個立法贍養父母的國家。新加坡年輕人既傳統又崇尚物質，貪圖安逸，對政治冷漠，英校生則缺乏自我身份意識，鄧亮洪：《與李光耀較量：新加坡異見者鄧亮洪回憶錄》，（香港：出版社不詳，2000），頁 102；約翰·培瑞（John C. Perry）著，林添貴譯：《新加坡的非典型崛起：從萊佛士爵士到李光耀，駕馭海洋的小城大國》，頁 366-367，462；〈新加坡立法應對養老挑戰〉，「新華網」網站，2013.5.13，http://sg.xinhuanet.com/2013-05/13/c_124699973.htm（2023.2.24 上網）；韓福光等著：《李光耀：新加坡賴以生存的硬道理》，（臺北：大地出版社，2013），頁 218-219，319，327。

¹⁷ 執政黨堅認「人民是與政治無關的」，而公共領域幾乎全由政府主導。李光耀指出，他毫不後悔地介入國民生活（如與誰為鄰、如何生活、用什麼語言等），「我們決定怎麼樣做最好，不用理會民眾怎麼想」，（新加坡）約西·拉賈（Jothie Rajah）著，陳林林譯：《威權式法治：新加坡的立法、話語與正當性》，（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頁 125，151；〈新加坡國父為國家留下穩定「遺產」〉，「Indo-Pacific Defense Forum」網站，2015.11.1，<https://ipdefenseforum.com/zh-hans/2015/11/新加坡-國父為-國家留下-穩定-%E2%80%89遺產>（2023.2.24 上網）。

¹⁸ 政府刺激文化創新的方法竟然僅是允許酒吧跳臺舞，准許同性戀者擔任公務員。2020 年 4 月 22 日，新加坡政府為阻斷新冠肺炎疫情散播，關閉非必要服務業，年輕人的反應卻是排長隊去理髮與搶購奶茶，約翰·培瑞（John C. Perry）著，林添貴譯：《新加坡的非典型崛起：從萊佛士爵士到李光耀，駕馭海洋的小城大國》，頁 376；〈新加坡關奶茶店防疫 年輕社群搶購不及超扼腕〉，「臺灣中央社」網站，2020.4.22，<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004220385.aspx>（2023.2.24 上網）。



據此，〈小〉是對新加坡的國族與國家寓言，而非王潤華所說的老舍的「預見」、「政治遠見」與對「新加坡今日社會的預言」，因為「新加坡今日社會」有違〈小〉這個「後殖民文本」意念。老舍只看到華人、馬來人與印度小孩一同遊戲，從未見過白人小孩和他們一起。他因而把白人小孩「故意的掉落」，¹⁹由直觀而聯想到三大種族「將來也許在同一戰線上去爭戰！」。²⁰〈小〉開端部分描述當時「新加坡人人喊著打倒日本，抵制仇貨」，小坡父親經營國貨店，所以「喊得特別厲害」。寫作〈小〉那年，日本已殖民臺灣三十四年，侵佔中國的野心昭然若揭，中國人普遍感到切膚之痛。小說以抵制日貨為伏筆，老舍不過是從現實中長期的中日惡劣關係、主權淪喪、民族緊張對峙中推測出勢所必至的歷史局面，亦即各族同仇敵愾抵抗日本擴張，並非來自老舍神秘不可解釋的「預見」或「政治遠見」。其次，這個「敵人」也當指大英帝國，才符合後殖民特性；可是吊詭的是，「新加坡今日社會」竟然高舉英語文化，這是老舍所「預見」不到的，又豈是「後殖民文本」？

此外，王潤華與小坡均認為殖民地時期，英校在相對馬虎中發展得最好，期盼擁有政府統整這種教育制度。如前所揭，後殖民文學是指「批判與抵制前宗主國在政治、意識形態、經濟、文化霸權色彩等方面滲透與關係的話語」，然而〈小〉始終沒有直接針對后殖民主義。除了較早進入現代化因素之外，英校表現優異固然源自英國的優良教育傳統，亦是對殖民地資源掠奪、分配、實施殖民教育與建立傀儡政府的知識-權力生產結構機制，更是文化殖民的重要渠道，後殖民批評者應對之抱持批判態度。〈小〉讚揚英校制度雖然出於客觀事實，卻無異於剷除了後殖民批評意識。不過，老舍回憶南洋時表示南洋「學校也很好」，「各色小孩都講著漂亮的國語」，由於廣東人與福建人之間的成見與爭鬥很厲害，所以「我

¹⁹ 老舍：〈還想著它〉，《老舍全集》第十四卷，頁30。

²⁰ 老舍：〈我怎麼寫《小坡的生日》〉，《老舍全集》第十六卷，頁179。



很希望將來政府能用力量去辦教育，得到統一才會收效」。²¹無論如何，他的「收效」絕非以英語作為母語的替代品。

既然王潤華裁定〈小〉是「後殖民文本」，則斷非新加坡獨立後近於蠲棄各族的母語而採用殖民帝國的語言來「統整」與「收效」，以致說不出「漂亮的國語」。後殖民的認識焦慮首先是「語言的焦慮」，²²語言是文化與身份認同的基址。然而事與願違，新加坡獨立後正是通過英語崇拜樹立政府威權與異質文化專制，把異質一統為同質，以國家民族（國族）邊陲化各民族文化，並強制納入與合法化為體制。此種民族身份的自我異化，用外語抑制後殖民社會的語言焦慮，形成一種弱勢與次等的多元社會。這也是與〈小〉此一「後殖民文本」相對立。

三、「大中華心態」與英殖民情結

王潤華的學生朱崇科承師之說進而堅認，小坡父親、小坡與老舍對異族的態度使〈小〉有一種「狹隘的民族沙文主義傾向」、「中國中心主義傾向」、「文化殖民」、「族群優越感」或「大中華心態或者說文化殖民傾向」。²³例如，小坡父親「對非廣東的華人都抱有偏見，何況是異族？」然而，這反而只能說明小坡父親並沒有「大中華心態」，至多不過是「大廣東心態」，廣東與中華不可畫上等號。他歧視福建人是出於他狹隘的民族與愛國主義，因為福建人賣「洋貨」，所以「不愛國」。職是之故，當小坡被哥哥責備不該和異族朋友玩耍時，小坡說：「我們一塊兒玩的時候，我叫他們全變成中國人，還不行嗎？」這純屬順應哥哥的意思與責問方式

²¹ 老舍：〈中國民族的力量—在國立山東大學 1934 年上學期第五次總理紀念周上的講演〉，《老舍全集》第十六卷，頁 484。

²² 徐賁：《走向後現代與後殖民》，（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頁 176。

²³ 朱崇科：〈後殖民老舍：洞見或偏執？—以《二馬》和《小坡的生日》為中心〉，《中山大學學報》（社科版）第 2 期，2007 年，頁 17-18。



的孩子氣回答。為了取回紅綢子，小坡要求學校的印度看守人開門遭拒，當進去取回後，「就手兒踢了老印度一腳」，後來又後悔致歉。這也許是「不好惹」的父親曾打過國貨印度看守，做了不良示範。不過須知道，印度看守在小坡心中是「偉人」。小坡的兩個志願就是「當看門的印度」與「馬來巡警」，欽佩他們「多麼尊嚴好看」與「有勢力威風」，所以第二天拿了落花生向印度看守賠罪。此外，小坡個性正直，打抱不平，十之八九為了「維持公道」而打架，所以不該目為「大中華心態」。

小坡看馬來人賣紅毛丹，「不吆喝，也不張羅，好似賣不賣沒有關係。」小坡問馬來人拿些紅毛丹上船賣去，「馬來人搖了搖頭」。老舍後來回憶：

我要表揚中國人開發南洋的功績……我們赤手空拳打出一座南洋來。我要寫這個。我們偉大。是的，現在西洋人立在我們頭上。可是，事業還仗著我們。我們在西人之下，其他民族之上……沒有了我們，便沒有南洋；這是事實，自自然然的事實。馬來人什麼也不幹，只會懶。印度人也幹不過我們……幹活是我們，作買賣是我們，行醫當律師也是我們……這不是英雄崇拜，而是民族崇拜。²⁴

〈小〉前半部是寫實書寫，是老舍一貫寫作前對社會觀察的產物，上述文字不但公允，而且符合史實。1903年黃亞福在新加坡創辦東南亞第一間華人銀行，象徵了南洋工商業的興盛與華人的貢獻。1913年，英殖民政府對馬來聯邦頒佈《土地保留法》，使馬來人固定在農業領域，華人從事錫礦開採或商業，印度人成為橡膠園工人、鐵路工程職工，馬來人仍在他們的村落過著自供自給的經濟生活。²⁵這是殖民者利用各族專長的「分而治之」政策。由於華人勤於勞動與善於經商，而

²⁴ 老舍：〈還想著它〉，《老舍全集》第十四卷，頁28-29。

²⁵ 韓方明：《華人與馬來西亞現代化進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頁94，101，111-112。



貿易與商業須立基於城市與港口，華人因此成為南洋開埠者，這是不爭的史實。相對於其他種族，華人教育水準也比較高。根據統計，當時的華人醫生、律師等專業人士人數可觀，「雖內地通商大埠，未必有此勝觀」。²⁶所以，老舍是「民族崇拜」，充其量近乎「族群優越感」，並無朱崇科所說的「狹隘的民族沙文主義傾向」，亦非「中國中心主義傾向」與「文化殖民」。

至於「馬來人什麼也不幹，只會懶」也非「中國中心主義傾向」，²⁷而是事實陳述，證之不誣，因為馬來西亞最具影響力的前任首相馬哈迪（Mahathir bin Mohamad）已於2002年承認了這一點。²⁸馬來人的民族性格在七十餘年前已在〈小〉中表述，這才是老舍的「遠見」所在。

²⁶ 劉繼宣，束世澂：《中華民族拓殖南洋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34），頁324。

²⁷ 早在1929年，已有中國學者批評南洋馬來土人「懶惰無聊」、「游惰愚蠢，不事經商」，李長傳：〈南洋史地教學的商榷〉，鄔翰芳：〈怎樣是適應於民族兢存的南洋華僑教育〉，劉士木等編：《南洋華僑教育論文集》第一集，（上海：國立暨南大學南洋文化事業部，1929），頁199，446。賽義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中提及阿拉塔斯《懶惰的土著之迷》（1977）這本后殖民批評著作，（美）賽義德（Edward W. Said）著，李琨譯：《文化與帝國主義》，頁355，362-365。《懶惰的土著之迷》試圖為馬來西亞土著翻案，如今已出版中文版。該書解釋指出，馬來人「不喜歡從事長期、周而復始的工作」，不願「成為殖民地種植園主致富工具」，在資本主義生活形態中沒有發揮功能，所以被評為「懶惰」，Syed Hussein Alatas 著，陳耀宗譯：《懶惰土著的迷思》，（新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2022），頁138，148，151。對此，我們必須理智和謹慎地分辨民族特性與后殖民批評，不可簡單混同並論。在《懶惰的土著之迷》出版四十八年前，難道上述中國學者與老舍也受英國殖民者的偏見影響？「長期、周而復始的工作」是現代工業作業特徵之一，說明了當時信奉伊斯蘭教的馬來人在生活上自供自足，未真正與直接受過內發性現代文明與經濟的洗禮，主要居住在鄉下，他們會否對殖民資本主義產生如此高度且普遍的覺醒？抑或當中夾雜民族主義或民族特性的成分？馬來人至今仍不致力於追求最大利潤，缺乏拼搏精神，競爭力落伍，須依靠政府提供的土著優先政策與固打制度改善經濟狀況。他們大多獲取土著優惠后，將產業轉讓予華人，不勞而獲，或掛名擔任企業要職，坐享其成，這是常見現象。

²⁸ 任相逾二十三年的馬哈迪醫生是種族主義者，觀察馬來民族鞭辟入里，不可能為殖民者的歧見背書。他繼承早年一貫的言論，坦承馬來人「懶惰、喜歡抄捷徑而不理會結局如何」，「如果將華人和他們所建立的事業撤出，馬來西亞就不會有大城小鎮，國內也不會有工商業活動，而且政府將無從獲取稅收來資助馬來人」，「到時候馬來人將回到他們被殖民的時代，貧窮、無知及被所有人鄙視」。〈巫統全國代表大會〉，《南洋商報》第3版，2002年6月21日。無論基於任何動機，此言絕對不受歡迎，但所言非虛，無疑反映了「恨鐵不成鋼」的慨歎。



無可否認，殖民主義推動了殖民地的發展，但對殖民動機應有所批判，因為其兩面性不是一種等價交易，更多是以物資霸佔、剝削與奴役為核心利益的戰略野心與政經企圖。相反地，新加坡建國後非但不反殖，而且以殖民地為榮為傲，流露為**英殖民情結**。執政者甚或選擇性讚揚英國，並選擇性貶低新加坡，「反映了矛盾的後殖民主義」。²⁹除了因地制宜外，西化滲透為本土化，本土融化為西化，「新」體西用，兩者交錯難分。新加坡不但沒有否定殖民政治，而且「以歌頌殖民統治的方式講述著國家歷史」。³⁰教育方面，學校採用英國「O」與「A」水準考試制；英國把掠奪資源有所貢獻的海盜殖民行為，用國家權力重新正當化為「英雄」、「探險家」、「商人冒險家」，³¹如萊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希索·金文泰（Cecil Clementi）等人是也。與之呼應，新加坡不少公路街巷與地方以殖民領袖或保留仿英街名命名，如 Farquhar（法夸爾）街、Leith（李治）路、Leith 公園、Queen（女皇）路、Victoria（維多利亞）路等。矗立新加坡河畔重要位置供國人瞻仰禮讚的不是華人先賢諸公雕像，而竟然是「開埠者」（帝國主義奠基人、鴉片貿易家與娼妓人口販賣商）萊佛士的銅像。官方也分別於 1969 年與 2019 年大事慶祝萊佛士登陸與新加坡開埠 150 與 200 周年。此外，還有後來設立的萊佛土地鐵站（1987）、萊佛士高教學院（1990）、萊佛士酒店（1991）、萊佛士醫院（2002）、萊佛士國際青少年藝術節、民間的萊佛士教育集團（1990）、萊佛士書社等。當今仍以打擊華校和排擠華人的希索·金文泰命名西南部一個社區、地鐵站、廣場、道路。³²這些都是新加坡獨立五十六年後的今天仍然擁抱殖民價

²⁹（新加坡）約西·拉賈（Jothie Rajah）著，陳林林譯：《威權式法治：新加坡的立法、話語與正當性》，頁 198。

³⁰（新加坡）約西·拉賈（Jothie Rajah）著，陳林林譯：《威權式法治：新加坡的立法、話語與正當性》，頁 258-259。

³¹竹田いさみ著，蕭雲菁譯：《盜匪、商人、探險家、英雄？——大航海時代的英國海盜》，（臺北：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2012），頁 7-8。

³²金文泰於 1930 年至 1934 年擔任海峽殖民地總督、馬來聯邦最高專員。他歧視華人，打壓南洋華商，推行親巫排華的強硬政策，讓馬來社會懷疑華人有所政治意圖。他限制華校教育發展，並主張受政府贊助的華校改為馬來文教學，廖文輝：《馬來西亞史》，（雪蘭莪：馬來西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7），頁 22；辜鴻廷：《東南亞華僑的認同問題：馬來亞篇》，（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4），頁 123-124。



值觀的確證，或為殖民情結符號的最佳符形表徵——文化文本（Cultural text），比比皆是。

保存古跡的原則誠然是尊重歷史，但也要道德判斷。當英美殖民帝國的種族主義領袖塑像被紛紛推倒之際，³³新加坡卻在建國後複製與再造殖民符號與殖民崇拜，而且凌駕於歷史正義與倫理之上。相對地，五十年代替新加坡華人爭取公民權、南洋大學創辦人陳六使，在辭世四十七年（2019 年）後，才在南洋大學原址（今南洋理工大學）上落得一條微不足道的「陳六使徑」。³⁴此外，百多年歷史的國家級華社古跡同濟醫院竟可公開轉售給酒廊餐館，讓步商業消費。這些錯亂的崇洋史觀與鄙視華人文化的表徵，和國族身份建構相悖，卻又何嘗不是「新」體西用的國策形態之一環？此等東方內部精英領袖對後殖民主義形式的呼應，以英語文化對本土意識轉化來進行；這在理論上「同構成殖民主義」，當謂「共謀的後殖民主義」。³⁵

後殖民文學是指「批判與抵制前宗主國在政治、意識形態、經濟、文化霸權色彩等方面滲透與關係的話語」，上述英殖民情結何嘗與小坡的「新加坡意識」應驗相符？

四、後殖民還是反殖民文本？

老舍的〈我怎麼寫《小坡的生日》〉發表於 1935 年 11 月 1 日，九天后發表〈一個近代最偉大的境界與人格的創造者——我最愛的作家——康拉得〉，仍對康拉得

³³ 見〈普林斯頓大學：觀點帶種族主義 威爾遜總統學院易名〉，《星洲日報》第 17 版，2020 年 6 月 29 日；〈女黑人雕像取代黑奴販子雕像〉，《星洲日報》第 21 版，2020 年 7 月 17 日；〈眾議院通過撤國會山莊爭議雕像〉，《星洲日報》第 25 版，2020 年 7 月 24 日；〈夏洛茨維爾聯邦雕像終拆除〉，《星洲日報》第 18 版，2020 年 9 月 15 日。

³⁴ 林友順，王建安：〈南洋大學等待平反 創辦人陳六使公民權何時恢復？〉，《亞洲週刊》第 48 期，2020 年，頁 34。

³⁵ 楊金才：〈後殖民主義理論的激進與缺失〉，《當代外國文學》第 4 期，1999 年，頁 153。



(Joseph Conrad, 又譯康拉德)的創作才能推崇備至,因為康拉德讓老舍懂得怎樣培養想像,怎樣先去豐富自己的經驗,而後以作品來豐富別人的經驗。老舍認為自己的作品「至好也不過能成個下得去的故事製造者」,「假設這能成為事實呢,我將永忘不了康拉得的恩惠。」老舍讚譽康拉德為自己「最愛的作家」與「近代最偉大的境界與人格的創造者」。³⁶

康拉德《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是東方主義作品,廣為後殖民批評家所非議,但它同時也描述白人到非洲剛果殖民,為爭奪象牙而彼此勾心鬥角,人性因第三國家的環境而變得墮落,熏心功利,道德淪亡。「黑暗的心」比喻非洲深處的剛果,也象徵人性的陰暗面。老舍解讀到在康拉德筆下,「東方人也因與白人對照而沒完全得到公平的待遇。可是在他的經驗範圍裏,他是無敵的;而且無論如何也比 Kipling 少著一點成見。」³⁷由此可見,老舍是自覺地反殖民主義,也似乎略含朦朧的後殖民批評意識。

老舍自言康拉德寫「南洋各色各樣的人,而且因著他的影響我才想到南洋去」;「我真的到了南洋了,可是,啊!我寫出了什麼呢?!失望使我加倍的佩服那《颱風》與《海的鏡》的作家」,³⁸亦即康拉德作品。就文本而言,〈小〉的內容沒有涉及經濟與文化殖民的批評,只有小坡的簡單的構想(「新加坡意識」)與老舍的「預見」,也不見王潤華舉證其後殖民批評話語。我們不禁懷疑僅就新加坡語言與文化霸權下的多元種族和平共處,〈小〉能否稱得上是後殖民文本?還是兒童幻想讀物?老舍認為〈小〉「不能算作童話」,因為「既捨不得小孩的天

³⁶ 老舍:〈一個近代最偉大的境界與人格的創造者—我最愛的作家—康拉德〉,《老舍全集》第十六卷,頁516。

³⁷ Kipling 中譯名為吉卜林,英國作家,作品多描寫英殖民地者在印度的生活(帶有種族偏見),老舍:〈一個近代最偉大的境界與人格的創造者—我最愛的作家—康拉德〉,《老舍全集》第十六卷,頁516。

³⁸ 老舍:〈一個近代最偉大的境界與人格的創造者—我最愛的作家—康拉德〉,《老舍全集》第十六卷,頁513。



真，又捨不得我心中那點兒不屬於兒童世界的思想」，亦即「聯合世界上弱小民族共同奮鬥」。老舍原本想要描寫南洋華人功蓋白人，但囿於時間與金錢因素寫不成，只好「打了個大大的折扣」，所以最後把〈小〉寫成「幻想與寫實夾雜」的「四不像」。³⁹顯然，他原定描寫南洋華人貢獻的可能性後殖民批評文本並未寫成，而〈小〉則是退而求其次的另一部非後殖民批評作品。我們決不可把老舍的創作初衷與創作成品等同視之，因為在老舍「後悔那時候我是那麼拿不定主意」的情況下，〈小〉中「小孩的天真」成分遠大於「不屬於兒童世界的思想」，只在後半部的小坡夢境中留下「小小的諷刺」，指向方言群的不團結、「馬來與印度人間的愚昧與散漫」。然而，就連著一點兒諷刺也隨著老舍「沉醉在小孩的世界裏」而「似乎把這個忘掉」了，唯有「自己還未全失赤子之心」讓老舍感到可喜與滿意。⁴⁰質言之，比照於新加坡的歷程與現況，〈小〉並非後殖民批評文本，而是反殖民文本，與五四時期的反帝反殖同聲共氣。

再則，我們旁及《神曲》、〈駱駝祥子〉與《黑暗的心》，和〈小〉進行相關論述或類比。身為基督教徒的老舍於 1942 年撰文歌頌但丁《神曲》（*The Divine Comedy*）對自己「受益最大」，這部基督教文學作品講永生、善惡、智愚、正邪、果報，「上了天堂，入了地獄」，讓他「明白了何謂偉大的文藝」、「肉體與靈魂的關係」與「文藝的真正的深度」。《神曲》的世界是「一首完美的詩」，老舍還搜集了許多關於但丁的論著，「成了但丁迷」。⁴¹除了《黑暗的心》，《神曲》也是早期含東方主義傾向的作品。薩義德批判《神曲》虛構想像回教先知穆罕默德（Muhammad）被打入第十層地獄受刑，生動又殘酷地描寫他痛苦的細節，如被惡鬼無休止地撕裂開來、流出腑臟與排泄物等，「強化了東方學的視角」。東方與伊斯蘭被表述為「在歐洲內部扮演特殊角色的局外人」。⁴²追根溯源，這

³⁹ 老舍：〈我怎麼寫《小坡的生日》〉，《老舍全集》第十六卷，頁 176，178。

⁴⁰ 老舍：〈我怎麼寫《小坡的生日》〉，《老舍全集》第十六卷，頁 178-179。

⁴¹ 老舍：〈《神曲》〉、〈寫與讀〉，《老舍全集》第十七卷，頁 10，113-114。

⁴² （美）愛德華·W·薩義德（Edward W. Said）著，王宇根譯：《東方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頁 88-89，91。



種東方主義的打就，是出於西方人不承認伊斯蘭教的合法性，一種穿越千年的宗教爭端。對比之下，老舍先前對《黑暗的心》的後殖民批評意識就此有所消融了，幾乎只剩下反殖民主義。當然，這其中關乎時代與個人眼界的掣肘。

王潤華在另一篇論文中以老舍〈駱駝祥子〉（簡稱〈駱〉）與《黑暗的心》並比，旨在以「平行與類同的角度來解讀老舍的作品」，以期「獲得一些新的、過去被人忽略的意義」。他指出，雖然老舍強調「不刻意摹仿任何文派的作風與技巧」，不過還是在〈駱〉中有意無意地摹仿康拉德的小說「主題結構」，亦即人物「被環境鎖住而不得不墮落」。⁴³老舍也留意到「空虛（nothing）」常常成為康拉德的故事結局，「不管人有多大的志願與生力，不管行為好壞，一旦走入這個魔咒的勢力範圍中，便很難逃出」，也就是「被環境鎖住而不得不墮落」。⁴⁴〈駱〉見證了祥子「從純樸的農村來到北京低層社會」，掉入虎妞的陷阱，健康癱瘓，不能拉車。虎妞難產後，祥子也墮落了，吃喝嫖賭，墜入「中國人的內心最黑暗的地方」。從結構比較而言，老舍「從康拉德的小說中大概得到不少啟示吧！」兩者一同「走向人類心靈的探險旅程」。⁴⁵至此，足見王潤華不再局限於後殖民批評的視野，而是從人性的拷問著眼。《黑暗的心》除了含有東方主義外，也具有現代主義特徵，深刻描繪白人的道德敗壞，從人性的角度解讀，不無更多面的意義。但是，誠如王潤華所言，人物「被環境鎖住而不得不墮落」是個「主題結構」，所以不僅止於結構層面，必定連帶涉及主題內容。如此這般「平行與類同的角度」之下，使到康拉德偏見下的黑暗東方與老舍筆下北京最黑暗的底層給加重地交織在一起。北京由主體逐漸被異化為「他者」，且自我「他者化」，與黑暗東方成為共同「墮落」的「環境」（「魔咒的勢力範圍」），不但印證了康拉德偏見的合理性，而且模糊了後殖民批評的視線，亦消解了對東方主義的警覺。

⁴³ 王潤華：《老舍小說新論》，（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頁 71-72，128-129，141-143。

⁴⁴ 老舍：〈一個近代最偉大的境界與人格的創造者——我最愛的作家——康拉德〉，《老舍全集》第十六卷，頁 517。

⁴⁵ 王潤華：《老舍小說新論》，頁 69-71。



按此推導，類比〈小〉的「後殖民文本」主題（「預言」與「新加坡意識」）和當前新加坡的後殖民文化文本主題（主調）（英語霸權與英殖民情結），將兩者相提並論，同樣會含混反殖民話語和後殖民景象，無法建立勾稽與對應關係。

既然老舍領略到現代主義作品的特質是表現「空虛」，則堪可與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的「虛無」（Nothingness）相通。我們不妨借用海德格爾的概念比喻與形容新加坡華人語言文化與社會失范下的後殖民文化文本，俾凸顯〈小〉的「後殖民文本」屬性之不可能，從而促進理解並獲得啟示。「語言是存在的家園」，日常語言是被「遮蔽」的「非本真」狀態，⁴⁶尤其棲居在技術性偏重的文化畸象、母語價值系統被宰割、世俗性統治精神文明的後殖民本位國度，加上國家機器生產的政治神話空間與打造的安逸環境，國人極易隨「大眾」/「常人」集體喪失「本真」。「此在」面對「空虛」（虛無），「被環境鎖住而不得不墮落」（「沉淪」），⁴⁷誤判後殖民文化為反殖民話語與後殖民批評，「存在」被「存在者」遮蔽；「一旦走入這個魔咒的勢力範圍中，便很難逃出」，辨析虛實。唯有預懼與領會「此在」的終點—死亡（文化危厄），方可自「沉淪」中驚醒，復歸「存在」而對後殖民文化做出省思。⁴⁸只有「詩」（藝術）與「思」（悟道）才是本真的語言。⁴⁹母語是民族的靈魂與文化系統的始源，只有不設限地回歸與深化語言言說的兩種基本方式（「詩」與「思」），非僅流於簡易交流的實用工具，新加坡華人才可真正擁抱母語的家園而抵達「存在」，建立文化與國家認同，不再於後殖民文化的包圍中

⁴⁶（德）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著，彭富春譯：《詩·語言·思》，（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1），頁 120-121，138-139，179-181。

⁴⁷ 於此以海德格爾對現代性日常生活的「沉淪」概念釋義「墮落」。

⁴⁸ 有關海德格爾的「常人」、「本真」、「此在」、「沉淪」、「存在」與「存在者」概念，詳見（德）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著，陳嘉映，王慶節譯：《存在與時間》，（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頁 4-10，52-56，140-143，155-159，213-218，363-369。

⁴⁹ 本文以「悟道」表意「思」，因為「思」是「邏各斯」的聚集運作，對「大道的歸屬與順應」，是「神秘的啟悟」，（美）帕特裡夏·奧坦伯德，約翰遜（Patricia O. Johnson）著，張祥龍，林丹等譯：《海德格爾》，（北京：中華書局，2014），頁 323。



「無家可歸」。華人必須先對母語至少有中階的掌握（民族文化認同），始能形成富有多元價值色彩的在地化（霍米·巴巴所謂）「混雜」語言（國家文化認同）。因此，〈小〉不是面對這種后殖民文化困境的「后殖民文本」。

老舍與王潤華兩人，和后殖民批評家對康拉德與但丁的有力鞭撻大相徑庭。緣此言之，老舍在創作技法上是前進的探索，在后殖民批評意識上卻相對地薄弱。他對康拉德與《神曲》的讚美，更有對后殖民批評意識叛離之嫌。雖然老舍意欲頌揚南洋華人，可是〈小〉沒能實現后殖民文學的可能性意圖，與本文對后殖民文學的定義趨異相左。其實，當老舍認識到康拉德「比 Kipling 少著一點成見」時，已隱約萌生后殖民批評意識。此後，他有所取捨，追求的僅是康拉德創作手法與探索人性的向度，正如老舍自言：「我已不再被康拉德的方法迷惑著」，「他的偉大不在乎他認識這種人與景物的關係，而是在對這種關係中詩意的感得，與有力的表現」。⁵⁰

五、結語

在現代政制掌控下，英國的教育傳統加上壟斷殖民地資源，所以英校辦得比殖民地其他民族學校出色是理所當然的現象。〈小〉讚揚扮演文化殖民角色的英校，反證了小說后殖民批評色彩的不可能，而所謂后殖民預言，正與新加坡的英語霸權與英殖民情結扞格矛盾。再者，〈小〉是老舍自言「打了個大大的折扣」之後的「四不像」作品，大大削弱了創作動機，只能視為反殖民文學，並非后殖民文本。相對之，指說老舍具有「大中華心態傾向」，也是不能成立，因為史實與史料足以證明他是如實中肯地反映當時的南洋社會現實。用平行與類同的角度

⁵⁰ 老舍：〈一個近代最偉大的境界與人格的創造者—我最愛的作家—康拉德〉，《老舍全集》第十六卷，頁 514，518。



解讀〈駱駝祥子〉與《黑暗的心》，人物「被環境鎖住而不得不墮落」這個「主題結構」最終將把北京低層導向黑暗的東方，合理化康拉德的偏見。借此類比解讀〈小〉的文學文本主題（「預言」與「新加坡意識」）與今日新加坡的文化文本主題（後殖民特征），亦是前後落差甚巨。除了《黑暗的心》，老舍對東方主義作品《神曲》讚頌不已，這是囿於時代環境對個人識見的限制。但是，老舍不久後自覺地僅追求康拉德式的人類心靈描寫，後殖民批評意識因之可能顯現在其他作品中。因此，〈小〉不是後殖民文本，而是反殖民文本。

六、徵引文獻

（一）專書

（澳大利亞）比爾·阿希克洛夫特（B. Ashcott），格瑞斯·格裡菲斯（G. Griffiths），海倫·蒂芬（H. Tiffin）著，任一鳴譯：《逆寫帝國：后殖民文學的理論與實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王潤華：《老舍小說新論》，（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

王潤華：《華文後殖民文學—中國、東南亞的個案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年）。

竹田いさみ著，蕭雲菁譯：《盜匪、商人、探險家、英雄？—大航海時代的英國海盜》，（臺北：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

老舍：《老舍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

呂元禮：《新加坡為什麼能》下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李光耀：《我一生的挑戰—新加坡雙語之路》，（新加坡：聯合早報，2011年）。

余英時：《現代學人與學術》，（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

（美）杜維明著，高專誠譯：《新加坡的挑戰：新儒家倫理與企業精神》，（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年）。



(美) 帕特裡夏·奧坦伯德·約翰遜 (Patricia O. Johnson) 著，張祥龍，林丹等譯：《海德格爾》，(北京：中華書局，2014)。

周清海：《華文教學應走的路向》，(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1998年)。

(新加坡) 約西·拉賈 (Jothie Rajah) 著，陳林林譯：《威權式法治：新加坡的立法、話語與正當性》，(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

約翰·培瑞 (John C. Perry) 著，林添貴譯：《新加坡的非典型崛起：從萊佛士爵士到李光耀，駕馭海洋的小城大國》，(臺北：八旗文化／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0)。

(法) 莫里斯·梅洛-龐蒂 (Maurice Merleau-Ponty) 著，姜志輝譯：《知覺現象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徐 賁：《走向後現代與後殖民》，(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德) 海德格爾 (Martin Heidegger) 著，陳嘉映，王慶節譯：《存在與時間》，(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

(德) 海德格爾 (Martin Heidegger) 著，彭富春譯：《詩·語言·思》，(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1)。

辜鴻廷：《東南亞華僑的認同問題：馬來亞篇》，(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4年)。

鄧亮洪：《與李光耀較量：新加坡異見者鄧亮洪回憶錄》，(香港：出版社不詳，2000年)。

(美) 愛德華·W·薩義德 (Edward W. Said) 著，王宇根譯：《東方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

廖文輝：《馬來西亞史》，(雪蘭莪：馬來西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7年)。

劉士木等編：《南洋華僑教育論文集》第一集，(上海：國立暨南大學南洋文化事業部，1929年)。



劉繼宣，束世澂：《中華民族拓殖南洋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34年）。

（美）賽義德（Edward W. Said）著，李琨譯：《文化與帝國主義》，（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

韓方明：《華人與馬來西亞現代化進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

韓福光等著：《李光耀：新加坡賴以生存的硬道理》，（臺北：大地出版社，2013年）。

Syed Hussein Alatas 著，陳耀宗譯：《懶惰土著的迷思》，（新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2022年）。

Homi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二）引用論文

1. 期刊論文

王嶽川：〈梅洛-龐蒂的現象學與社會理論研究〉，《求是學刊》第6期，2001年，頁23。

朱崇科：〈後殖民老舍：洞見或偏執？—以《二馬》和《小坡的生日》為中心〉，《中山大學學報》（社科版）第2期，2007年，頁17-18。

林友順，王建安：〈南洋大學等待平反 創辦人陳六使公民權何時恢復？〉，《亞洲週刊》第48期，2020年，頁34。

楊金才：〈後殖民主義理論的激進與缺失〉，《當代外國文學》第4期，1999年，頁154。

2. 引用報紙

〈巫統全國代表大會〉，《南洋商報》第3版，2002年6月21日。



3. 引用網站

〈新加坡立法應對養老挑戰〉，「新華網」網站，2013.5.13，
http://sg.xinhuanet.com/2013-05/13/c_124699973.htm（2023.2.24 上網）。

〈新加坡國父為國家留下穩定「遺產」〉，“Indo-Pacific Defense Forum”網站，
2015.11.1，<https://ipdefenseforum.com/zh-hans/2015/11/新加坡-國父為-國家留下穩定-%E2%80%89遺產>（2023.2.24 上網）。

〈新加坡關奶茶店防疫 年輕社群搶購不及超扼腕〉，「臺灣中央社」網站，
2020.4.22，<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004220385.aspx>（2023.2.24 上網）。

